

中国心理学得到大发展是我最高兴的事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先生

林崇德¹, 罗良^{2,3}

(1.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2.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
3.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被访者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现任教育部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学和心理学学部召集人, 《心理发展与教育》主编, 中组部联系高级专家。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 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心理学报》副主编等职。曾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4)、“全国劳动模范”(2000)、“全国十佳师德标兵”(2001)、“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2)、“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014)等荣誉称号。长期致力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先后主持了二十余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和科技部等重大重点项目。撰有学术专著《林崇德文选》、《发展心理学》、《教育与发展》等近二十部, 在国际国内发表 SCI、SSCI、CSSCI 论文四百余篇。研究成果荣获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和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政府业务奖励二十余项。“教书育人”是其挚爱的事业, “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是其教育理念。他的“严在当严处, 爱在细微中”的育人观被教育界和学术界广为称颂。

【关键词】 心理学; 中国化; 重大需求; 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5)03-0141-13

林崇德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位教育学(心理学)博士。他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心理学研究中国化, 在国际上发表的原创性智力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他一直坚持心理学研究要服务好国家重大需求, 在中小学课堂和汶川地震心理干预培训现场频现他的身影; 他作为中国心理学重要学术带头人之一, 带领大家协同创新实施大科学研究; 他作为研究生导师“师德为先, 严慈相济”, 培养出了一大批“值得他自己崇拜”的人才。林先生这些成就的背后有哪些故事与艰辛? 他从事心理学研究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本人很荣幸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特约采访人和撰稿人, 与林先生进

行了深度交流。

一、心理学即我的生活

罗: 林先生, 您好! 首先对您百忙之中接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专访表示感谢。林先生, 我还清晰记得, 您在 2009 年中国心理学会一次大会上说“心理学即我的生活”,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 并下决心学习心理学的?

林: 哎呀, 这个话题说来就长了, 还要从初中说起。我是在上海浦光中学读的初中, 当时并不知道有心理学这个学科, 更别提对心理学感兴趣了, 但我从小立志。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 我在语文书里

【收稿日期】 2015-03-18

【通讯作者】 罗良, E-mail: luoliang@bnu.edu.cn

读过一篇关于詹天佑的课文,我就被这位伟大的富有爱国精神的铁路工程师的事迹深深感动,想当个铁道战线的技术员,向詹天佑学习,说不定还能当个现代的詹天佑。到初中三年级时,就面临着毕业去向的问题,基于我的家庭情况我想早点独立。就跟班主任老师说,我想考中专,考什么专业呢?于是我的志愿确定为上海市铁路中专。但是,1957年,我初中毕业期间,赶上了国家“反右”斗争的政治运动。那一年,上海取消了中专和技校的招生计划,我唯一能报的是高中和中等师范学校。面对新形势,我忐忑不安,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这时我的班主任老师鼓励我说:“我已经看出来,你是我们班颇有出息的学生,因为你刻苦、认真。我希望你能考上海中学,在那里可以住校,这不比中等专科学校差,因为按照你的家庭情况,说不定能申请人民助学金,能供你吃饭,供你生活,我想这跟中专又没有什么两样。毕业以后,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将来能够当一个出色的工程人员。”就是我的班主任张佛吼老师关键时刻的一席话,指引了我人生的道路。就这样,我以九取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市著名的中学——上海中学。

考入上海中学以后,从高一到高三,我的信念都是要考上海交通大学或唐山铁道学院,学习詹天佑的精神,为国家建造更多的像南京长江大桥那样的伟大工程。但是,这种理想后来在悄然发生变化,之所以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班主任孙钟道老师的影响,特别是孙老师在1960年3月份上的一次物理课,给我很大触动。一天上午,班主任孙钟道老师来上物理课,当时上课的典型模式是,老师先提问上一节或上几节课的一些内容或问题,然后让学生回答,回答以后老师打分,再开始上新课,可是我们班有位同学没能很好地回答孙老师的提问,这个时候,年近花甲的上海市劳动模范孙老师感慨万千:“同学们,再过几个月,你们就离开学校了,我希望你们能成为国家的栋梁。若干年以后,当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取得了成就,那便是我当教师的人生最大的欣慰和幸福。如果你们中间谁做了一点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那就是我最大的不安,最大的惭愧。”忍泪说到这儿,孙老师已经激动得说不下去了,他拿着板擦转身去擦黑板,想掩饰一下激动的心情,可是黑板上没有写下一个字,他又回过头来,眼里含着泪花,艰难地说:

“人之失落啊!学生不争气,会让老师感到耻辱。”那一刻,我脑海中闪过一幕幕老师教导、关怀我的场景。

高中二年级时,我老家的母亲得了重病,我把她带到上海,父亲陪她去看病,尽管把她的病医治好了,但是家里却十分困难,我获悉兰州铁路专科学校来招插班生,生活待遇是每个月给22元助学金,这样不仅我每个月吃饭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每月给妈妈钱,为了当个孝子,我当时就不想在上海中学上了,想去报名这所专科学校。可是,班主任孙钟道老师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不仅给我讲了“忠”与“孝”的关系、小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而且他还亲自替我向学校申请了除甲等人民助学金之外的零花钱。不仅让我吃饭没有问题,还能够买一些报刊杂志和参考图书。记得高二时孙老师向我指出,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希望我能够完成在上海中学的学业,然后能够考上我自己梦寐以求的上海交大或唐山铁道学院,将来真正能够实现自己的夙愿,当一位像詹天佑似的人,对国家作出贡献。

那次,当听完孙钟道老师的一番感慨,我联想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比较了詹天佑这样的桥梁隧道工程师与孙钟道老师那样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对于人类发展的价值。那一刻,在我刚度过19岁生日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不消失的印记,使我改变了自己的志向,决心要当一位像孙老师那样的老师,当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为什么选择了心理学呢?我当时已懵懂地知道,培养人必须从心灵入手,就这样,在我当年升学考试的23个志愿上,全部填写了“师范”,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专业,从此为我自己的心理学生涯拉开了序幕,可以说从那时开始,成为心理学家的志向再也没有动摇过。当然,五年大学生活肯定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知识与师范教育所熏陶,使我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专业理想。但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仍是能够奠定我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人生基础的上海中学,我有上海中学的情怀,我永远忘不了自己的母校——上海中学。

罗:您是从小就立大志呀!我们心理学人都要感谢孙钟道老师,否则中国心理学将失去您这样一位学术大家,那将多么可惜呀!

林(微笑):孙老师对我的影响我终生难忘,但

中国心理学没有我并不可惜,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做了该做的事情!

罗:您太谦虚了,林先生,您大学毕业之后,好像没有直接从事心理学研究,而是到基础教育当了13年教师,之后才回到高校从事专业研究的,这又是为什么?

林:我是1960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当时,我的人生目标就很明确了,那就是为党的事业而学习,要当一名出色的心理学家。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集中了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光是心理学专业教师就有15位,其中有4位对我的影响最大,按为我们授课的先后顺序是彭飞、张厚粲、朱智贤和章志光四位老师。在心理学专业学习上,我应当感谢两位老师。一位是张厚粲老师,她是教我们基础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统计学这三门基础课的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我后来的导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心理学的引路人——朱智贤教授,朱智贤教授是整个心理学乃至教育系最受尊重的教授之一。朱智贤教授有两点对我影响最为深刻:一是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二是他对创新观念的重视。

为了成就心理学家梦想,我在学习中,既重视书本知识学习,也重视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在大学五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心理学专业能力也得到了很好发展,朱智贤教授给我的大四学年论文的批语是“此文接近《心理学报》发表水平。再作适当修改,作为毕业论文。届时我将推荐到《心理学报》发表。”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到了大学五年级,我们再也没有那种又红又专的气氛,相反地,按照当时的社会要求,我们需要进行思想清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日记被泄露了,日记里有那么一句话:“为什么国外有心理学派,惟独中国没有?”这是我学心理学史以后的一种体会,仅仅是一种体会,写在自己的日记里面,我觉得这有什么啊?但是,1964年暑假以后,学生思想清理运动首当其冲的是我,我被确定为教育系的白专尖子,从此以后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批判我的“只专不红”思想,批判我成名成家的思想,并上纲上线责问我:“为什么要建自己的心理学派?”

我成了众矢之的野心家。我的毕业鉴定起先几乎没有什么优点,却有三条严重的缺点:第一,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第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指老师)划不清界限;第三,企图成名成家,资产

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对这三条缺点,我并不否认,但是鉴定中没有优点,感到非常遗憾。我去找我们敬爱的总支书记于若琳老师,她是一位老革命,是在延安长大、在革命的战火中成长的女干部(1965年,我们毕业后,她调回国防大学,晋升为将军),当时担任我们的总支书记兼我们的系主任。我就跟于老师说:“于老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可是我怎么大学五年一条优点都没有,这是一分为二吗?”于老师也感到非常奇怪,好多同学都为我提了优点,比如学习刻苦、认真,怎么会没有优点呢?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按当时的观念,我是为名利而学习,这个大前提错了,就一错到底了,因此,也不会有什么优点了。

于老师毕竟是一位好领导,她让同学们帮我找优点,优点是这么来的。1963年暑假,我回上海,那一年天津海河发大水,周恩来总理下命令“炸海河,保天津”。为保住天津,水往南流,河北衡水等地区可是汪洋一片,京浦路有半个多月没有通车。我在上海,刚好要北上回北师大学习,不能回来了,怎么办呢?我在上海组织了浙江的、安徽的、福建的、江苏的、上海的等等,那些不能够北上的同学,这些同学有北师大的、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北航的,等等,一共组织了五百多人。我们很有组织观念,我担任总指挥,有人管经济、有人管生活安排,我们跟北师大校方联系,北师大领导给我们往华东师大电汇了500元钱,我们把这些同学安置好,使大部分同学能够坐上火车到山东烟台,由烟台坐轮船到天津,再由天津塘沽坐火车回北京上学。我和另外108名同学,最后包了一节车厢,在第一天能够通车的时候乘上火车,于9月3日回到北京,迟到了3天,因为9月1日开学嘛。我迟到了,但是我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后来这件事情经过调查,确认可以认定“林崇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助人为乐的思想”。嘿,我有优点了,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同学又给我提了好多优点,又找了总支书记于若琳老师,我要求在缺点前面也加两个字。于老师就问:“你的优点前面有‘一定’,是不是缺点前面也想加‘一定’啊?”我说不是,要用“一度”:林崇德“一度”阶级斗争观念薄弱,“一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不清界限,“一度”名利思想严重。我说前面只要加“一度”两个字,就说明三个缺点都是“一度”,以前是这样,现在改了,好了,进步了。我是带

着这三条缺点离开北师大的,在分配的志愿表上,我第一志愿填了“坚决服从党的分配”;第二志愿填了当时最艰苦的地方“贵州”,为什么没有填新疆呢,因为新疆在我们心理专业总共只有一个名额,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同学回去,那我当然不用填了,我填了贵州;第三志愿是我愿意去的地方——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有关领导对我说,第二志愿要党员去,贵州要搞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你不是共产党员,你不适合去贵州;中国科学院,本来是个成名求利的地方,你一个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你怎么能到那边去呢?于是,把我同其他十一个同学一起分到北京基础教育界。因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说过,有些分不出去的学生,留下来在北京搞刘少奇同志倡导的“半工半读”,也就是搞职业教育。我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开始新的生活,走上了教师岗位。

就要离开师大时,我向几位敬爱的老师一一告别,唯有不敢进朱老家的门。那天晚上,我在他家楼下徘徊多次,也可能是缘分,朱老刚从操场散步回家,见了我十分高兴,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崇德,不要灰心,不要委屈,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还要相信自己,有信心,总有一天你又会搞学问的。一切真知来自实践,你到中小学实践中去还是有作用的,好好干吧!”

毕业后,我先到北京郊区密云县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搞过一年时间的“四清”运动。1966年6月回城,经两个星期的培训,就去宣武区当文化大革命小学工作队队员,工作一个半月,被批判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执行者”达半年,经过一段“逍遥”时光(未参加文化大革命任何派别组织),1967年11月,被分配到北京市雅宝路中学任教。工作了10年后,又调往10年一贯制的三道街学校当了两年多的干部和老师。其间当班主任、任课、做教育管理、经营校办工厂,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心理学研究。

罗:您在基础教育工作的这段时间,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在那种氛围下,您是怎么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呢?

林(微笑):我是偷偷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已被打倒了,但是我对心理科学的感情依旧,对心理学研究的“贼心不死”。心理学不能研究了,我可以研究朝夕相处的教育啊!何况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正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于是,一到中学任教,我就想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

我的第一项研究是从对品德不良学生心理特点开始的。在雅宝路中学,由于生源差,品德不良的学生多,于是在我所教的原初二,后来变为初三的69届学生中,有意识地积累品德不良学生的心理档案材料或研究材料。那时,我自己班里进过公安局的学生有12位,我就把他们的材料都一一整理好了,记录他们何时开始品德不良,何时开始“违法犯罪”进公安局;在整个品德不良的过程中,有哪些认识方面、情感方面、意志行为方面的问题;思考教师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方法才能够使他们进步等问题。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就运用“个案法”,一一梳理他们的个案材料,研究品德不良学生的心理规律。其他老师们整天看到我整理品德不良学生的个案,好奇地问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可不能说在研究心理学或教育科学,可是我明明在进行个案研究,搞品德不良学生的心理学研究,怎么办呢?我冠冕堂皇撒谎说:“我在研究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一些青少年的基本情况,又在琢磨着如何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泥坑中间拉回来,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完全是谎话、空话、大话,我真正的目的是在研究品德不良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可是我敢承认自己的研究行为吗?同事们看我是那样的认真,于是他们又为我提供各班大量的个案。就这样,我前前后后对总共近一百位品德不良的学生进行了追踪,到1977年时,我追踪最长的被试为10年,最少的也有4年,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品德不良中学生的心理学研究》,

这篇文章在1979年11月的中国心理学会学术年会上,由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的徐联仓教授交给当时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同志。当时,彭真同志对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非常重视,他在一次会上提到了这个问题,要求进行科学研究。徐联仓教授把我的这篇文章交给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十分重视,约好于1980年1月的某一天要听取我的汇报。因为彭真同志和他夫人张洁清同志临时要去南方视察工作,就委托最高法院院长杨秀峰同志到会。汇报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那天,杨院长还带来了胡绳同志(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及一系列法学专家,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北京市宣传部、北京市教

育局等相关领导都到了会场,我认真真地向他们汇报了我对品德不良中学生,也就是违法犯罪的青少年犯罪过程的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也受到了报刊的宣传。没有想到,1980年1月,我的这场报告成为我成名的开始。后来有人评价说,这是一种偶然;可是好多心理学前辈却认为偶然中间有必然。特别是徐联仓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悲壮的默默无闻的过程中,可我却是在心理学的土地上悄悄耕耘,因此今天的成名是必然的,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罗:您对智力的相关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林:我对智力(认知)及其发展的研究是从1972年开始的。那年我当了校办厂长,而我的前任是我的好友——化学老师王旭明,他发现有些学生在工厂实习、实践后,学习化学知识就更快、更好了。我让其教的两班,一个班去电镀总厂(我们学校当时由北京电镀总厂接管并派了工宣队),另一个班不参与实习实践,结果发现,接触过电镀的和未接触过电镀的两个班学生,在学化学的某些内容上接受程度就不一样。当时,我认为王旭明老师进行的是一个教育心理学对照组与实验组对比的研究,接触校办厂电镀的班是实验组,相反的那个班是控制组。从中我体验到一点,中小学是老师搞教育科学研究很好的场所。

于是,我在雅宝路中学开始进行教育心理学或认知(智力)培养的实验研究。那个时候,突然一个双生子的对比研究进入了我的视野。说来也怪,雅宝路中学双生子特别多,这就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比如说,有一对双生子叫徐1和徐2,父母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他们长的很像,而且有三个东西特别接近:第一,都是班里面的班干部;第二,学习成绩都非常好,1977年都考上了大学;第三,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打乒乓球,他们都是我们雅宝路中学校队的队员。可他们只是异卵双生子,为什么他们的智力、品德和兴趣爱好那么接近呢?对此,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他们两个人从小就形影不离,父母总是一起来教养和教育。于是我在雅宝路中学收集了十几对同卵双生或异卵双生子的资料,后来又通过协和医院和东四妇产医院收集了很多资料。在北京,只有这两个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对出生的儿童有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

的记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遗传学和心理学同时被打成了伪科学。中国科学院有两个研究所最惨,一个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已经被砸烂了,副所长丁赞和曹日昌两位研究员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离开人世;另一个是遗传学研究所,所长童第周院士扫厕所扫了10年。虽然如此,而我却总在思考遗传和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我整整用了三年多时间收集资料 and 进行测试,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尽管心理学还没有从“伪科学”中解放出来,但社会气氛好了很多,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两篇文章《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智力发展上的作用》、《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性格发展上的作用》。

在教学的实践中,我在思考着,为什么有的学生成绩好,有的学生成绩差。除了非智力因素以外,在思维活动中有什么特点呢?于是我非常重视学生的思维结构。我在自己的教学笔记本里,把思维的目的性、思维的过程、思维的材料、思维的规则,特别是反思型的规则,都作为思维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后来我又调到三道街学校,不仅有中学部,还有小学部,我开始接触了大量的小学学生的数据。于是我围绕着中小学生的数学能力,研究起发展与培养的问题。发展研究容易,因为在横向上可以利用“职权”在不同年级(年龄)上测试,还可进行追踪纵向研究,这样,对中小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就有数据了。但培养呢?我每天深入这所10年一贯制学校不同年级听课,分析成绩起伏原因,最后我把思维品质确定为培养智力与能力的突破口,并在学校培养教学能力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在此基础上又写了两篇文章《小学生运算能力的发展与培养》、《中学生运算能力的发展与培养》,在这两篇论文中,我把运算中思维或智力的具体数据也展示出来了,这是我的思维或智力结构观的雏形。这就是参加1979年中国心理学恢复以后第一次学术年会时我提交的文章,并且以《儿童青少年运算能力的发展与培养——兼论智力结构》为题做了大会发言的文章,受到不少与会的老心理学家的肯定。德高望重的心理学泰斗陈立老先生当着朱智贤教授的面对我说了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在投入斗批改,斗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批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四人帮’要求的规章制度。可是你,这位年轻人却在斗批改的夹缝中间,冒着心

理学已经被打成伪科学的危险在认真搞研究。你的精神难得!你今天报告的成果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是必然的了。”

二、心理学研究要中国化

罗:谈到智力结构,我们都知道,您曾经在国际权威心理学杂志《理论心理学》(*Theory & Psychology*)上发表了您的智力结构观。这篇文章还跻身该杂志自创刊17年以来所有六百余篇论文“被阅读次数最多的50篇文章”排行榜,位居第五位(注:SAGE Publication网站2006年年底发布的数据),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心理学家提出的、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智力理论模型,您能详细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智力理论的提出过程与核心观点吗?

林:这个智力理论模型,又被很多国内同行称为“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之所以是“聚焦思维结构”,是因为我在自己的心理学观中,首先强调“思维核心说”。人与人之间个体智力是有差异的。人类个体之间智力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思维结构的差异。因此,只要解决了人类思维结构的问题,人类智力的种种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为此,我提出了自己的思维结构模型。我国心理学界不少评论文章称它为“三棱结构”。这些评论里最有权威性的一位是黄希庭教授。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那本《心理学十五讲》里就有很重要的小节来介绍我的思维的三棱结构。黄希庭教授还在2009年《心理科学》杂志上撰文,提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霖院士的“拓扑知觉理论”和林崇德教授的“三棱结构”为我国心理学界近30年的两项原创性成果。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其实黄希庭教授本人才是原创性的典型,他对时间认知和人格两方面的研究,是常人不能比拟的。他的评论对我来说是一种启发,是一种鞭策,是一种激励。

这个结构是我在从事基础教育的研究过程中,经过理论联系实际提出来的。1965年到1978年,我曾经在中学当教师和教育组长(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教务主任和政务主任之和),当我深入听物理和化学课时,总要和物理教师和化学教师讨论有关物质的结构,这种自然科学结构观引起我对心理结构,特别是智力结构的兴趣。我当时想:“物理是有

结构的,难道心理就没有结构?”于是在这个过程我就逐步地提出了这个结构模型。1979年11月在“文革”后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学术年会上,经恩师朱老的推荐,我向大会作了有关儿童青少年数概念与运算能力的发展的大会报告,初步展示了这个思维结构模型。后来,我协助朱老指导的首批5位硕士研究生,在和他们讨论中,我又逐步完善了这个模型。1982年,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最早恢复的中国心理学会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它的人数占整个心理学人数的将近70%。第一次学术年会是在云南开的,我利用云南开会的机会做了问卷调查。因为我在之前就经过与学生的讨论采用开放问卷。后来我干脆把前面提得比较多的10项抽出来让大家来划勾。我找了100多位与会代表中的五六十位心理家给我“划勾”,后来我取有效问卷50份来分析。我又到中学做其他问卷的时候,我选了比较有声望的25位老师给我打勾,又选了小学有声望的25位老师给我打勾。就这样做了从开放到封闭的两次问卷。结果表明,有六种因素在被试中赞同的比率超过或者接近第三个四分之点,就是75%。于是我就把这六个因素按其在思维乃至智力中的地位和功能,制作了三棱结构图,这个图我最早发表在我的《中学生心理学》、《智力发展与教学》几本书中。1981年我还将其发表在《心理学报》上。后来经过完善,我就把它写入朱智贤教授和我共同撰写的那本《思维发展心理学》上。这个结构包括的六个因素具体是:思维的目的、思维的过程、思维的材料、思维的品质、思维的监控、思维的非认知因素,具体内容我就不展开说了。

我为什么要国际上发表自己的智力结构论文呢?也就是你提到的这篇文章。因为在中国的教育界对加德纳的多元智力宣传有点过头,讲的也太多了。《幼儿画报》竟开辟一本专刊叫做“多元智力”。连美国的心理学家都说:“对多元智力的宣传,你们中国比我们美国对加德纳吹捧还要多!”英国心理学家菲立普说:“加德纳多元智力论是垃圾,值得这么宣扬吗?”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加德纳的智力观就引起了我的关注,尤其是1987年在盐湖城“第七届世界天才儿童与天才教育会”上经人介绍,我和董奇教授认识了加德纳,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右手提着包、左

手提着风衣,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前走,从不看两边。这就是加德纳,太有派了!一直到2000年,在斯德哥尔摩第27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我对李庆安等几个学生说:“前面那位就是加德纳。”他们说:“是吗?你怎么认识的?”我说:“他那个样子我永远忘不了。”

1987年从盐湖城回来的时候我仔细琢磨了加德纳的观点,突然想起来加德纳的观点我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在我们老祖宗的著作里见过,那就是从西周的官学到2500以前孔夫子的私学里边提到六种课程,这就是“六艺”。于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边明确的提出加德纳的观点与我们古代的“六艺”有着相似之处。我们的“六艺”就是七种智力。有人说:“怎么没有自知智力?”我说:“六艺里头明确提出‘礼’,这就是人际关系。但是‘克己复礼’,‘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这难道不是自知智力么,不是自我控制智力么?”我们“六艺”所讲的七种智力和加德纳所讲的七种智力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与加德纳的观点又不完全一样。倒并不是由于时代不同,一个3000年以前、2500年以前,一个是现代,一个是古代,不完全是。我们也并不强调我们比他早,我觉得更主要是要强调两点。第一,加德纳认为,七种智力是独立的、毫无关系的,我们六艺则强调是以“礼”为核心的相互联系性:内外是有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包含或者相关、相融的关系;交叉的关系等各种各样的关系。第二,加德纳现在搞的,还是实验学校的材料,他的“未来学校”还处于实验阶段,而我们老祖宗3000到2500年以前就已经把“六艺”列为课程了。因此,我感觉我们老祖宗高明,我们的老祖宗了不起,我们不能够忘记自己的祖宗,更不能一味崇洋媚外。

罗:不忘记祖宗,不崇洋媚外,这是不是您一直坚持心理学研究要中国化,提出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理论的根本动力呢?

林:可以这样说吧,我至今仍然不能忘怀恩师朱智贤教授给我说过的一段话:“当我们打开美国心理学的著作时,给我们展示的所有资料,除了瑞士皮亚杰的研究以外,基本上都是美国自己的材料;当我们打开苏联心理学的著作时,给人一种强烈的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似乎他们是世界第一。然而,看看我们自己的研究时,我们感觉非常惭愧。

1949年以前我国心理学学西方,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学苏联,现在又有一种新的趋势,即返回来去学西方。如果按照这种路线走下去,何年何月才能有我们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呢?包括儿童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呢?我们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家,是有四大科技发明的古国,有大批古代思想家所奠定的中国心理学的思想体系,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很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科学呢?你归队,回来当我的研究生,咱们师生有缘,因为你13年以前就是我选上的好学生,你应该珍惜自己13年从事基础教育的实践经验。你选择一个时间再回去,回到中小学去,从新的角度,而不是从前你当老师的角度,是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去研究儿童青少年,希望你为心理学,特别是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的中国化做出自己的努力!”

遵照朱老的教导,我在开展心理学研究时,一直坚持三个原则,一、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即使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在*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上发表的“在多变世界中的品德发展:中国的观点”一文中,也明确提出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心理学研究一定要坚持唯物辩证法。二、突出中国情怀、世界眼光和时代特点。如上面提到的“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虽然借鉴国际智力理论的精髓,但其出发点是中国古代的“六艺”;又如,我提出的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十大关系,专门论述了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国际化。三、始终贯穿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红线。我在1985年《心理发展与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试论我国儿童青少年前进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坚持研究中国现实、研究中国文化和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罗:谈到知识体系,林先生,很多心理学名家到了研究后期,都会在已创建理论上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实现从理论到哲学观的飞跃,您有自己的哲学观吗?

林: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很多心理学名家都会在晚年提出自己的哲学观,他们绝不是为了要提出哲学观而提出,而是他们在长期思考和

论证自己理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的高度概括、理论化的观点,即哲学观。我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也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的哲学观不可的话,可能用实践反映论最恰当。

什么是实践反映论呢?我曾协助朱老师撰写过一篇文章《反映论与心理学》,对这一哲学观进行了初步阐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这一哲学观:首先,实践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活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由于它,人们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等等。其次,人的心理、认识、意识等反映活动是包含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心理、认识、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源泉和动力。再次,人的实践具有能动性,是能动地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活动。它不是无生物的机械性运动,也不是生物的反应性行动,而是一种能动性的反映,是人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最后,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关于人的实践性反映,必须在本体论上坚持物质第一性(客观现实和人脑)和反映(心理、认识、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以区别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反映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大量的论述,结合心理学研究,我认为实践反映论有6个基本特点:(1)人的心理反映的决定性;(2)人的心理反映的社会性;(3)人的心理反映的主体性;(4)人的心理反映的发展性;(5)人的心理反映的主观能动性;(6)人的心理反映的系统性。我目前在自己开展的各项研究中,都更加突出实践反映论的哲学思想。

三、心理学研究要服务好国家重大需求

罗:太好了,您的哲学观一定对您的心理学理论与研究又有很多新的拓展和概括。林先生,您是心理学家,但我看有学术文章称您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播火者”,这又是为什么?

林(微笑):称呼我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播火者”是一些记者对我的赞美吧,不敢当!我是学习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的,不算教育家,但我对基础教育的确情有独钟,我学术研究的一半重要内容是建构基础教育的理论体系,并且我做了大量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实践工作。

前面提到过我在基础教育工作过13年,我从基础教育第一线归队之所以又投身基础教育进行改革实验有四个原因。一是服务基础教育国家需求,我一直强调,心理学一定要服务好国家需求,而基础教育领域是心理学,尤其是教育和发展心理学能够满足国家需求的重要方面。二是恩师的教诲。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体系,朱智贤教授希望我能够在重视自己13年的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投入到中小学去搞实验研究。三是我忘不了在基础教育第一线自己的教育生涯,更觉得这13年的教育经历、教育实践、教育经验不比我在大学系统地学了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差,相反地我觉得更有价值。如果在理论的指导下,重回基础教育第一线,那么肯定使教育实践有所升华,在基础教育的理论上能够形成自己的体系。四是对自己研究生培养的需要。我把基础教育实践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一种方法、一种手段、一种途径。基于上面四个原因,从1978年,我重回基础教育第一线,开始搞以培养思维品质为基础的教改实验。我的实验学校覆盖到26个省、市、自治区,从黑龙江五常县到广东遂溪县,从上海市黄浦区到新疆天山脚下,从内地偃师市到沿海瑞安市,共有3000多个中小学实验班。通过参加实验,几乎每一个实验班的教学质量都提高了,学生过重负担减轻了,出现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景象。1984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同志曾在会上表扬这些教改实验,认为这些成果改变了一些教育现状,提高了教育质量,其意义不亚于获自然科学一等奖。许嘉璐副委员长(1998年7月)也肯定我在实验点的做法(中小学一起抓,并进行多门课程的改革)及产生的诸方面成效,并指出这些研究在国内也是惟一的。

在整个实验研究过程中,我不仅仅重视在第一线的学生智能和品德的提高,不仅仅关注教师素质的提升,不仅仅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且我在积极地汇总数据,总结调查研究结果,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并出版相关的专著,为建构基础教育的理论体系,在做自己的努力。

罗:您能给我们展开讲一下您建构的基础教育理论体系吗?

林:中国人重视“六六顺”,我这里也讨一个“顺”吧!在我为基础教育改革而建构的理论中,我选六种。这“六”种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或是较为

独特的基础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第一,探索教育的实质及其功能。我把教育功能列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五项内容。在基础教育领域,我不仅对五种功能的内涵及表现作了论述,而且利用心理学方法,对每种功能都突出了可操作性。

第二,如何培养智力,我强调学校教学是一个“智育”的过程而不是“知育”的过程。教学的目的在于传授知识的同时,灵活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智力和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我就把思维品质看作是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突破口,基础教育各科怎么改革,我想就应该从思维品质入手。直到现在,我和我的团队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教改实验”就是围绕着思维品质培养的实验。

第三,如何认识中小学的学科能力。我结合中小学教育改革,探索学科能力的构成。从1978年以后,我一直在我自己的思维结构的理论体系下进行应用研究。我和实验点的老师反复讨论后,基于思维品质这个突破口,提出了培养中小学的智力与能力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学科能力。什么叫学科能力,基础教育界以前很少有论述,我对它的界定三个含义:一是学生掌握学科的特殊能力,二是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智力活动及其思维与能力的成分,三是学生学习某学科的学习能力、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

第四,研究了中小学德育与非智力因素培养的问题。我是搞智力的,为什么要写品德的书呢?因为,我认为德育为一切教育的根本,是教育内容的生命所在;德育工作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在基础教育中,如何抓德育呢?我在《品德发展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一是要抓品德结构;二是要把握中小学生学习品德发展的年龄特征;三是要抓学生品德的“质”的提高;四是把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看作是德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我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心理健康问题,1983年,我在《中学生心理学》一书里提出需要开展心理健康和心理卫生研究的设想。我认为心理健康是学生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重视德育就应该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我进行了这方面的大量研究,提出了有关的设想,就这样,1997年,我当选为“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的

主任。到了2007年,这个委员会改名为“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我仍然当主任。从2001年起,我和弟子俞国良为教育部起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历时一年,在反复讨论、修改、审定之后,于2002年8月由教育部作为重要文件颁发,对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的指导思想、原则、内容、途径、方法、组织、管理等作了纲领性地规定,对我国中小学心理教育提出了实施方案,2012年,按教育部要求,我又组织力量对《指导纲要》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到了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以后我围绕着震后的心理疏导问题多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并组织了国家培训班,辅导灾区中小学的教师。就这样,为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决策和理论。

第六,教师素质的构成及其提高的途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大量教育实验中,我们发现学生成长及发展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归根结底是教师素质的问题。于是我对教师素质的问题,包括师德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研究。1984年,我在国内最早提出了“教师参加科研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几经周折,这一观点终于被全国基础教育界所认同。为帮助教师成长和提提高,我专门撰写了《教育的智慧》一书,2014年,我又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亲身体会和科学研究,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项目支持下,出版了《师魂——教师大计 师德为本》,帮助教师提升自身师德水平。

随着教育改革实验的积极开展,社会上有些报道就说我的“名字在中小学兴起了一股旋风”。在杭州,1987年9月6号,《浙江日报》报道了临海市浙商小学教师王金兰在多年的教改实验中,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创造了“快乐的教学法”,使学生得到了兴趣,教育质量得到了提高,他们整个实验得到了我的理论的指导与支持。1996年,在北京通县举行的第十二届教师节庆贺会上,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说:“北京市有17所中学特色校,因林崇德教授教改实验得到他的学术思想而获此殊荣的有4所”。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的教育理论在中小学里面的影响力。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特级教师,北京五中吴昌顺先生曾说:“林崇德是中小学教师的老朋友,是我们最欢迎的

名教授之一”。《中国教育报》打破了常规,在7期和12期两次分别介绍了“林崇德学习与发展观”和“林崇德有关智力发展的理论”。《光明日报》三次追踪报道了我的教改实验,我的基础教育的教改理论的体系及其成果。我的教改实验,还得到了电视媒体的关注。早在199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东方之子》,宣传各条战线做出杰出贡献的那些学者、专家、劳模,播出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坚持我在中小学搞实验,并形成了基础教育有关的理论体系。我记得《东方之子》拍摄的地点是在琉璃厂小学,播出以后收到了全国各地中小学实验点的老师对我的鼓励、支持,他们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

罗:林先生,您除了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满足基础教育的国家重大需求外,我看您还承担了另外一项教育部课题,课题名称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经济信心的重建与就业能力的提升”,您还研究经济心理学吗?

林(微笑):我并不研究经济心理学,这个课题也是我“胸怀国家”的一种体现吧!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为此,教育部社科司委托教育部社科委员围绕“金融危机”展开应急性课题研究,我作为教育部社科委员也有责任出一份力。当时,我就想,信心对应对金融危机很重要,而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高知群体,他们的信心对社会更重要,而且他们的信心会直接影响就业选择,为此,我把课题名称定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经济信心的重建与就业能力的提升”。我们这个课题整体实施的还不错,既为国家提交了高质量政策咨询报告,还发表了系列学术文章。

四、心理学研究要协同创新

罗:林先生,您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既提出了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创性理论,又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满足了国家重大需求,可以说已经很成功了,但您为什么还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呢?

林:在国际上发表原创性理论,自己的理论被基础教育界广泛接受并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良好效果,是让人很高兴的事情,但从内心讲,这些还不是最让我高兴的事情,我最高兴的事情是看到中国心理学得到大发展。心理学在中国是个小学科,我们

要团结国内各地心理学工作者共创中国心理学的未来,以便赶超国际心理学的水平。

罗:这就是为什么您一直提倡坚持心理学研究要协同创新的原因吧?

林:是的,事实上,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组织全国专家协同开展研究,尽管当时协同创新的概念在国内还没有提出来。早在上世纪我就牵头全国专家协同开展了三项大型研究:与全国10个省市心理学工作者一起对在校青少年的理想、动机、兴趣开展了研究;与全国23省市心理学工作者一起对在校青少年思维发展开展了研究;与全国29省市心理学工作者一起对离婚家庭子女心理特点开展了研究。

进入新世纪,也就是最近10余年,我又作为牵头人,组织了几项大型的协同创新研究,我感觉这几项协同创新研究,在全国心理学同仁的努力下,还真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

第一个是我作为第一主编,由400多位心理学家参与,历经10年于2003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心理学大词典》;

第二是我作为第一主持人,组织近百位心理学家翻译了八大卷的《儿童心理学手册》,这是国际上最前沿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文献;

第三是我作为第二首席专家(第一首席专家是董奇教授),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与来自全国31省市自治区的52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医院的相关科研力量(近300位教授、副教授,近1700名研究生)深度合作、协同创新,于2007年开始,开展了我国第一项全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状况调查——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历时5年,研制了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的指标体系与成套工具,首次在心理与教育领域实现了全国代表性取样、完成了近20万6—15岁儿童青少年及其抚养人的数据收集,构建了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的系列国家基础数据库,已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并为国家相关领域重要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四是我作为主持人,承担的教育部重大项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研制,目的是把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具体化、细化。该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河南大学等5所高校96名研究人

员共同联合攻关。项目组比较分析了 15 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的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开展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理论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和课标研究,访谈和问卷调查了 12 大群体的六百余名有影响力专家的观点并加以统计分析,最终形成包括社会参与、自主发展和文化修养三大领域十个指标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总框架。2014 年 6 月 27 日,教育部委托教育部前副部长王湛同志组织全国各界院士、资深教授、教育部门领导等 70 多人对该研究成果进行审议并顺利通过。

2014 年,我的这些工作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牵头的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成果的一部分,帮助该中心成功认定为国家协同创新中心,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国家级的平台上可以做更多协同创新的工作,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推动中国心理学发展。

罗:正是因为您带领大家长期坚持协同创新,您成为了中国心理学界里面人缘和人气最旺的学术带头人,有人甚至称呼您为中国心理学界的“四条汉子”之一和“四大天王之首”,说您在中国心理学界的位置不可替代。您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具体给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才能成长为一名优秀学术带头人吗?

林:我非常不愿意甚至很反感中国心理学界“四条汉子”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指沈德立老师、黄希庭老师和杨治良老师)或者所谓“四大天王之首”的说法,对于说我在中国心理学界的位置不可替代的观点,我只苦笑一下而已。

我先讲讲我个人成长为学术带头人的经历吧,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当过的最高行政职务只是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像我这样一名没有太高行政职务的书呆子能成为全国心理学的学术带头人,靠什么呢?主要是团队力量!

从 90 年代初,尤其是从 1993 年开始,我和沈德立、黄希庭等几位老师发誓要把中国心理学建设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的学科,欣欣向荣的学科。我们靠什么推动当初约定的目标的呢?团队的力量,要努力改变中国心理学界存在着拧不成集体的局面。我们这么做了,获得全国同仁的肯定。所以后来几次心理学大会上,我们几个人在全国理事无记名投票中都是高票当选副理事长。我还在 2009 年高票当选为理事长。我从中体会

到,我们目标是正确的,因此目标的实现并不是靠我们几个人,而是靠整个中国心理学领域大家的力量。我们靠的是团队的力量、集体的力量;靠的是一种团队的精神、集体的精神;靠的是团结、全国同行的团结。对我来说,实现了自己 1985 年提出的“广交友、不树敌”的理想。

中国心理学界的学术带头人,尤其是我是怎么靠团队力量来进行工作呢?这主要是靠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我们集体当带头人,引领着中国心理学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努力工作的基础。靠哪些组织机构呢?

一是靠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的学术大会和专业委员会的一些活动我们都积极地参加,发表我们的观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心理学作为一个小学科,要心齐团结,决不能够搞尔虞我诈。尽管现在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常务理事换届,我们都只是普通理事了,我们的学术声望仍然在其中起作用。学术声望是一种无形的指挥系统,能协调全国学术队伍万众一心以图共同发展。

二是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学科评议组。因为心理学要发展,全国都需要发展的平台,要博士点、硕士点。而我们这些人都希望中国心理学的博士点越多越好,硕士点越多越好,因此我们从来不限制有些地区的发展,只要够条件、条件成熟我们都积极努力促进其发展。我还记得,当时为了辽宁师范大学,这样不是一个博士点单位的学校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博士点,我们做了相关专家工作,后来,这个博士点上去了,这个学校因此获得了迅速发展,并且这个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因此,我理解心理学学术带头人的职责是支持全国心理学界搞好平台建设,以此推动学科发展。

三是靠教育部的司局。沈德立教授在逝世前,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我和京津沪的三位教工委副书记一起当副主任,2014 年,我又被任命为主任。我还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的主任,董奇和莫雷两位教授是副主任。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教育部对我国心理学建设的关心和支持。2008 年“5.12 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后,我们正是靠教育部的力量把全国心理学家团结起来,为抗震救灾中的心理援助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就要靠全国团队力量。我

敢说中国心理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齐团结、繁荣兴旺。具体到学术带头人的标准,我把它概括为四个一流:拥有一流的学术成果;带出一流的学术队伍;引领一流的学术方向;具备一流的学术品行。对于它们的内涵,我就不阐述了。

五、心理学大发展关键是要培养出一流人才

罗:您刚才提到学术带头人应该符合四个一流的标准,在前面的介绍中,您已经让我们领略到您在学术成果、学术方向和学术品行三个方面一流的风采,事实上,您不仅在上述三个方面做的特别好,您还为中国心理学培养出了大批一流人才,您能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吗?

林(开心笑):你刚才夸奖我在学术成果、学术方向和学术品行三个方面一流,我真的不敢当,我可能做的稍微好一些,但是不是一流真不敢说。但唯独在人才培养方面,我敢说培养出了一批一流人才,这批学生是我最崇拜的人。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中国心理学要大发展关键就是要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因此,我在30多年导师生涯中,特别注重学生的培养。截止到2014年底,我已经培养出了82位博士,还带出了10余位博士后。他们具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业务上过硬,先后有2位博士生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位毕业生成长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9位毕业生在国内外高校或科研机构中担任教授,42位已经成为和我一样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第二、综合素质高,大部分学生既能够当专家,又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目前担任校级或是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学生已超过20位(其中,2位成为全国人大代表,1位成为人大常委),担任各高校或科研机构系主任(或院长)的学生数量更多。第三、做出了突出业绩。有的毕业生将文章发表了在国际高水平杂志上,有的毕业生自己培养出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有的毕业生成为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罗:您培养出了这么多一流人才,您的秘诀是?

林:我自己已经当了30多年的导师,回顾自己的导师生涯,从最初作为副导师协助朱智贤教授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到独立指导,我逐渐摸索了一些当导师、带研究生的经验。如果说秘诀,那就是导师要“师德为先”,对待学生要“严慈相济”,要以

培养超越自己的学生作为教育目标。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培养出超越我自己、值得我自己崇拜的学生。

我认为,无论是做好研究生导师,还是其他类型的教师,其关键都是坚持“师德为先”。在大学里,教育的对象大多数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硕士研究生都是20多岁,博士研究生有的已是拖家带口,教育的内容更多要涉及到学术问题,因此,对高校的老师来说,既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又要有扎扎实实的学术功底,这样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承担起国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担任研究生导师的过程中,我体会到高校教师师德的特殊性。2004年10月,我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表彰为五位“师德模范教师”之一,参加师德报告团,在人民大会堂和全国各地巡回报告,因为我是这五位教师中唯一的高校教师,我在对高校教师师德的特殊性理解上,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回答记者提问的:第一,高校教师的师德应以崇尚学术为基础;第二,高校教师师德以培养杰出人才为标志;第三,高校教师师德要以不谋名利为行为准则;第四,高校教师讲究师德,要以教育创新为前提。

师德为先,对待学生主要体现在师爱上,师爱是教育学生的情感基础,只有饱含着师爱的教育才能以心灵浇灌心灵、以生命感动生命,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心灵沟通的桥梁。1986年,我送董奇教授到美国学习,当时董奇教授夫妇二人都在国外,他们能否准时回来,并不单纯考验着博士研究生董奇教授,对作为导师的我也是一种考验。董奇教授夫妇后来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决然按时回国,带了好头,发挥了榜样作用。从1987年起,我先后送出多位博士研究生出国,我光送到美国的博士研究生就有16位。因为我送学生到发达国家去进行联合培养,这有利于他们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他们更快地成为高素质创造性人才。送出去的这16个博士生,15位按时回国。当时,教育部有关的司、处的领导,他们都觉得非常奇怪,在当时2/3以上的留学生都不能按时回国的情况下,林某人学生的回收率为什么那么高?我记得《中国教育报》还委托中国教育学会的一个处级干部,到北师大来开了个座谈会,董奇教授、申继亮教授、陈英和教授等人参加。她问:“你们为什么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换句话说,不

管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你们放弃了这些优厚的待遇。你们回来了,为什么”?他们几位居然说是冲着我,冲着导师而回来。他们还调查者说:“你可以问问我们的林先生”。当时调查者非常奇怪,来问我。一看,我其貌不扬,也没有什么魅力。她问:“你怎么会让学生冲你而回来?”我回答:“哎呀,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深层的东西,我只能够做这样的回答:“‘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我对学生仅仅是做了一点‘感情投资’罢了。”“感情投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师爱。那就是《中国教育报》的《他像一块磁铁》一文的来源。

攻读博士学位是学生生涯的最高阶段了,这些博士生即将成为国家最需要的创造性人才。怎样才能培养好博士研究生呢?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教书育人中要“严慈相济”,做到“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因为爱必须严,“严师出高徒”,严是爱的另一种表达。为此,我坚持“做好一个定位、把好两个关口、重视三个环节”。“做好一个定位”主要指首先清楚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根本区别在哪里,即明确不同层次人才质量的本质要求是什么?例如我认为作为一名合格博士研究生,最根本的衡量指标有两个,一是科研独立性,二是创新能力。把好两个关口,首先是注意生源质量,为此我提出了博士研究生的“五不招原则”:考前没有任何成果的人暂时不招,面试时没有发现创造性思维的不招,通过深入调查发现没有拼搏精神的或不勤奋的不招,看不出有成就动机的不招,有才无德者不招;其次是引导研究生过实践关,作为一名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要到大中小学校去实践,必须要熟悉学校、熟悉学生、熟悉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重视三个环节,即知识结构形成、科学研究开展和学位论文撰写三个环节,博士研究生要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核心是要解决博与专的问题,让他们能在“博”的前提下成为一名“专家”。

罗:您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学生,做出了这么大的业绩,您肯定是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争夺的“高级人才”,您想过换单位吗?我感觉目前国内挺

流行通过换单位,提高自己身价和待遇的。

林(笑):争夺的“高级人才”谈不上,想请我去的人还真不少,从省市的师范大学到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从一般大学到“985”著名大学皆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上海某著名大学,以提供一套别墅的待遇希望挖我过去,我一直没有答应,连续找我谈了两年才放弃。2005年的一天,我一弟子匆匆来找,直言不讳,传达他们领导的意图:“林先生能否调动一下?”如果去他们学校,200万科研经费,一套140m²住房,20万年薪,另外加50万安家费。我听了“哈哈大笑”,加以谢绝。但不久,好友黄希庭教授来找我,问我是否要调往××大学,蛮有风趣地说:“那所学校的声望可比师大高啊!”接着,从2005年到2007年,三所学校都以所在地方的办学经费分别是10万、6万和30万聘我去兼职当“客座教授”、“特聘教授”和“长聘教授”。尤其是在北京的那所大学,推荐人是心理学界泰斗级的中科院荆其诚先生和北大著名学者朱滢教授,针对这一切,我似乎内心有一股憋着多时灼烫的泥浆像火山爆发般往外涌,于是在2007年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香山会议上,我除了出自衷心地荆其诚先生与朱滢老师致以谢意,我迸发了内心一种情怀:“生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人,死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鬼”。我还清晰的记得,第二周,听闻此消息的时任北师大校长的钟秉林教授专门到我办公室对我这种忠心表示感谢。我当时已过花甲之年,我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留给培养我并长期供我增长才干舞台的北京师范大学。我会一如既往地给我发了聘书的30余所大学义务兼职,但我更热爱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岗位,我要在北京师范大学当好心理学学术带头人、当好导师,用自己全部力量投入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中去。

罗:谢谢林先生!我们相信,中国心理学在您的推动下一定会发展的更快更好!再次感谢林先生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给我们介绍您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祝您老身体安康,青春常在!